

回忆亲历的几件往事

陈中岳

镇反运动

为巩固新诞生的革命政权，1950年12月全县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我当时在公安局，经历和参与了一些活动。

解放初期，经过剿匪反霸斗争，时局初步安定。但潜伏的国民党党政骨干分子，中、军统特务分子，反动道会门分子及土匪、恶霸等互相勾结，进行破坏。特别是1950年6月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以后，潜藏在本县的特务、土匪活动猖獗，暗杀、抢劫、倒算，秘密串连组织地下武装，搞反革命暴动等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县大土匪、大恶霸陈秀峰（陈大肚）曾奸淫妇女116人，杀害我军人员及无辜群众69人。解放后，潜逃至湖南衡阳，化名苗秀卿，后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当时郝股长带一个班（配两挺机枪），从湖南衡阳押解回长葛，1950年5月份公审枪决。那天，局长的通讯员小王从号里把陈提出来，让他束上腰带（因为犯人入狱不准束腰带），陈大肚带有手拷不会束，这个“老称”240斤的陈大肚虽然住了几个月，消瘦了不少，但小王给他束腰时，一搂仍搂不住，让他一手拉住一头，小王围他转了一圈才给他束上腰带，可见刮民脂民膏的陈秀峰，确实肚大名不虚传。

1952年秋季，组织上派李同喜和我到苏州去逮捕押解王幼卿（国民党救济院长，曾克扣救济粮饿死无辜儿童数十人）和伪镇长朱敬先。李同喜在苏州等我，我去上海华东公安部换了介绍信。在逮捕朱时，苏州公安局刑警队的同志把朱叫来，朱不承认叫朱敬先，改名朱敬轩，聪明的同喜同志一听他是长葛口音，一开口就说，你不是朱敬先，你是谁？别装洋蒜了。朱一听是长葛口音，把头耷拉下来，承认自己是朱敬先。我们二人押他俩返回长葛，路上铁路乘警、列车员帮了不少忙，腾出了靠近厕所一头的座位。我们面对两个杀人阎王，把心都提到喉咙眼儿了，生怕出了问题，特别到了南京浦口，当时没长江大桥，火车需要轮渡，唯恐他们趁机跳江。就规劝他们只

要老老实实回长葛坦白自己罪恶，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回到长葛后终因他们罪恶滔天（朱曾杀死急性土改时积极分子七人）而被人民政府镇压。

杨景贤任国民党长葛县党部书记长，杨亲自布置其部下胡玉钦到禹州古城调查共产党地下活动，逮捕在石固工作的共产党员郑宜亭。1947—1948年（民国36年冬至37年）春，长葛进入“拉锯”状态，杨景贤杀害解放军工作人员十余人，又同石固镇长张雅亭一起，杀害我方积极分子十四人。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杨景贤，在湖南长沙落网。组织上派我带一个战士，从长沙将其押回后，被公审枪决。

镇反运动中，我两次携带摸底排队名单，到区、乡和当地党政领导联系。当时警力有限，完全依靠当地党委指派民兵参与抓捕。有次到中岳店乡，局长信上写道：“中岳店乡党委负责同志，今有我局陈中岳同志去……”，我还好笑中岳店正好叫陈中岳去，当天晚上分工赴各村抓捕。第二天迎着朝阳我和民兵押着28名人犯，胜利返回县城。镇反中，下乡调查材料，当时一没有汽车，二没有自行车，完全靠双腿跑。许东方（坡杨村指导员即支书）参加公安局工作后，分配和我一组下乡调查材料，背上行李，带上名单，跑遍全县，白天访问群众，晚上就住在村办公处。有的连床也没有，就把两张方桌对在一起，晚上天冷东方和我就挤在一起，打“老通”，互相取暖。走到蔡庄、桂庄时，雪越下越大，一不小心掉到雪沟里，就互相连拉带推爬上沟顶。

镇反中有一件事需提及。在押罪犯张××（东关人），串通煽动其他罪犯，以夜惊方式乱喊乱叫，有的已窜到狱门，企图越狱。我和预审股长袁宏央很要好，夏天两人乘凉住在一起。听到监所里呼叫声，立即紧急集合全队武装进入临战状态。袁股长深入狱房了解情况，有的已将被子撕成布条接在一起准备作越狱用，袁股长连夜突审有关罪犯。很快查清情况，呈报上级批准后，第四天就将企图暴动越狱犯张××等四人，枪毙正法。

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4年元月26日，长葛县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历时七天，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部署迎接互助合作化高潮。

为了正确指导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1953年秋，县委成立了互助合作办公室，人员是各单位借调的，县社张法顺，农技站李保合，县委书记王克

勤找到公安局长，要我去办公室，我即到了县委。

1950年7月全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坡胡乡胡学章互助组（换工互助形式）成立；1953年3月20日，长葛第一个初级合作社——石固乡宗庄郑秀堂社（牲口、农具作价推平，土地入社按地劳分配）成立。1955年冬长葛第一个高级社（取消土地报酬，各户生产资料作价入社实行按劳分配）——增福庙王水旺高级社成立。农业合作社迅猛发展，当年春季全县有1549个社，入社54400户，占55.8%，到年底就发展到2183个社，入社83159户，占84.5%。

合作化初期上边规定了很多条条框框，如多少户组成及骨干（党员）多少名等，限制群众积极性，但汹涌而来的合作化高潮冲破了这些规定，所以毛主席批判合作化运动中的清规戒律是“小脚女人”。没经批准成立的就叫“自发社”，我就领着城关高朝俊、大周朱修正等十多个“自发社”到许昌学习过，学习合格后才“转正”。

互助合作运动也有阻力，主要来自地多人多劳力壮，牲口农具齐全生产条件好的富裕农民。他们怕入社吃亏，有的转移了生产资料。初级社创办初期，我带了一个工作组在坡胡乡发展农业社。李保合同志分在南门里吃派饭时，轮到有个绰号叫“老白毛”的富裕中农家。开饭时，他们不吃，只给工作组拿了发霉的玉米饼子，工作组走后他们吃白面烙馍。工作组认为这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我让保合再吃饭时将发霉饼子带回。当晚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宣讲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批判“小脚女人”以及对合作化的几种错误态度等，并组织大家展开讨论，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发展。

当时，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县领导都搞有重点，（老）城关的孙小狗社，和尚桥的张法田社，石固的郑秀堂社，坡胡孟排的马同义社，增福庙的王水旺社，都曾经是县委领导的重点。他们深入实际贯彻党的政策，听取群众意见，改进指导工作，使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

“反右”整风运动

一九五七年，我从长葛报社调回县委机关工作。该年十月整风运动开始，我被派到整风办公室工作。抓整风运动的领导有县委副书记石立志，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培林等。办公室还有孙汉卿，负责报表统计。整个运动除了由石立志挂帅外，县委还分了文教卫生、财贸、工交、党政群等战线，每条战线都有常委负责。

整风运动是在“极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运动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是党政机关，工交、财贸系统；第二批是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各单位都分配有划右派的比例。工作人员每天要摘抄大字报，由单位、战线领导组逐级上报，最后上报县委整风办公室，由领导敲定谁是极右、右派、中右等。极右是敌我矛盾，批斗后送往内黄劳改农场。右派批斗后清理回家，中右作为内部矛盾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留在机关监督改造，以观后效。

划分右派的标准有六项，大体是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统购统销政策，以及破坏中苏友好关系等。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运动搞得扩大化了，如县委机关的机要员高庚申、打字员刘云钟、刘长根等都属这类。刘云钟大鸣大放时画了一幅“树林和鸟”的画，标题为“一鸟入林百鸟惊”，误认为他是攻击党的领导，划为极右，送往内黄劳改，后死在农场。长葛报社总编辑王近杰（16级），在参加省里知识分子座谈会时有些“言论”，也作为右派。因为他是16级干部，县委没权批，地委没有批，稀连糊涂下放到后河长葛五中教学去了。因为划得面太大，最后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把右派压缩为1000多人。仅全县统战对象中就划右派分子720人。这些人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有了明确的政策，才陆续平反。最后平反718人，摘帽2人，复职716人。

浮夸风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照耀下，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万马奔腾，欣欣向荣的局面。这种可贵的精神，很快被“极左”思潮所代替，认为共产主义很快就可到来，农业上一大二公，越大越好，破坏了生产关系。水利建设违背自然规律乱上工程，比如开挖的许扶运河，完工后不久，就成了干沟。坡胡的暖泉湖，原来水可自流，流经水磨河、营张、坡胡等村，是条小河，沿河还装有水打磨，搞农副产品加工。主观上想挖大点，水可能更多些，但挖后，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农业产量上是越报越高，竟出现了农业上的所谓高产“卫星”。遂平小麦，放出了亩产七千多斤的“卫星”。我县也放出了小麦亩产高达1516.5斤的“卫星”，“长葛报”还发了“号外”专刊。1958年我在县委办公室负责联系农业生产的上报下达。电话联系，各乡党委书记上报玉米产量，汇总起来全县十万亩玉米平均亩产3328斤。我的头脑也发涨了，认为我县也放出了“大卫星”。写了一篇稿子送河南电台、河南日报，他们都发表了，报

社还配发了短评，在浮夸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粮食产量越报越高，征购任务越来越重。农民已经没口粮断顿儿了，还说有很多余粮，搞起了下面是秸秆铺底，上面是粮食罩面的假粮食囤。县委还组织基层干部参观让人说谎话。为了“一大二公”全国各地都成立了公共食堂，搞起了“吃饱肚子”不要粮票的“共产主义”，农民的锅、刀等炊具，“大办钢铁”都给炼钢铁了。开始还能吃得饱，但好景不长，由稠到稀，份量由多到少，到瓜菜代，到吃麦秸淀粉，甚至连榆树皮都剥下来，磨成榆皮面充饥，最后揭不开锅，被迫解散大食堂。不少人得了浮肿病，妇女得子宫下垂病的很多。到1960年底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11650人。大牲畜也因饲料不足，死亡4750头。

这个血的教训世世代代都要记取。想问题办事情千万要实事求是，千万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深翻改土

1953年，中央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颁发后，中共长葛县委召开第一次党代会，除听取县委工作报告和选举事项外，作为主要议题讨论了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初步规划，提出了实现规划的意见。

《纲要》中提出，要用多少年的时间，粮食产量分别实现四、五、八的要求，即黄河以北地区年产四百斤，淮河以北地区年产五百斤，长江以南地区年产八百斤。这在当时（平均麦子50公斤上下，玉米只有一百公斤左右）生产条件没多大改善，耕作粗放的情况下，却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为了探索实现纲要提出的奋斗目标，指导农业生产，县委书记吕炳光和我到农业生产比较先进的坡胡乡去座谈。在营张村座谈参加的有营张的张福增，石固的郑秀堂，孟排的马同义等人。马同义介绍了他们的发现和经历。他们那里种葱围葱挖过的沟种玉米，以及井旁伐掉的树坑种玉米长得格外好，结的棒大，意识到这是肥土层加厚的结果。于是他们就在深耕上打主意，有一亩二分地，深翻地1.5尺（平常肥土层只有六、七寸），分层施肥。办法是施60%的底肥于地表面，将第一行（宽50公分）翻开，熟土堆积一旁，将底肥的40%，分施于生土层上，深翻30公分，使土肥搅拌均匀，再把第二行熟土移于第一行生土上，以此而行。全部深翻后，浇塌墒水，当年玉米就亩产五百三十六斤半。

吕书记听后十分欣赏，认为“八字宪法”土为首，终于找到了解决全县的肥土层不深的好办法。接着召开现场会，在全县推广了深翻改土的经验，全县1957年，社社行动，户户深翻。随着深翻的大面积推广，突出矛盾是用工多，劳动强度大，进度慢。在这种情况下，增福庙、宗庄等地又出现了前犁后套分层施肥，或前犁后翻人畜结合深翻办法。为了适应这种办法的改进，全县兴起了工具改革热潮，县委成立了工具改革办公室，关根荣为主任。改革的工具主要是耕作深翻机具，收割脱粒工具、运输工具、提水工具，农产品加工工具等。县里挑出有代表性的7182件，在县政府门前举办了工具改革展览会。《河南日报》、《人民日报》发了消息，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参观，李先念副总理在1958年4月14日也亲自来视察指导，并称赞长葛人民真正发动起来了！

深翻改土加厚了肥土层，有利于农作物扎根生长，吸取养分。城关乡新路二社利用火炕育苗，红薯搬家培育壮苗，再加上深翻土地，前犁后套集中窝施肥料等办法，获得了红薯高产。1958年5月河南红薯种植工作会议在长葛召开，全省各地（市）县委书记156名参加会议。这样，深翻改土既获得了玉米小麦丰收，也取得了红薯高产的经验。

为了总结全县深翻改土的发现、发展经过，以及深翻的几种办法和注意的问题，县委办公室作了一次集体讨论，最后由张继先同志主笔写了一篇经验性的文章。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县委书记吕炳光带着这篇文章，就长葛深翻改土情况作了介绍。毛主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和称赞，说这是“一大发明”。1958年8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员吴芝圃陪同下视察长葛宗寨村（后改为八七村，以纪念毛主席视察）。县委书记吕炳光、副书记王连安参加，说当他们沿着生产小道走到一块四十余亩深翻过的玉米田里，看到管理细致，没有杂草，毛主席很有风趣地说：“你们长葛无葛啊！”正是长葛的深翻改土，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与表扬，才使长葛在全国出了名。不久全国深耕改良土壤流动现场会在长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厅长，农科院及部分地区农业科研单位200人参加了会议。中科院土壤所熊毅所长，带领科研人员驻点孟排。全国20多个省、市组织代表团来长葛参观学习，1958年9月《深翻土地》一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在1966年一次纪登奎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又问到长葛县委书记，现在在什么地方。这时原书记吕炳光因已调许昌专署任办公室副主任。接任县委书记张汉英得以调入北京。

我于1960年秋至1961年在孟排马同义所在的十一队蹲点和马同义同吃

同劳动，对深翻改土作了更深入的了解、研究。因此，1974年，我和吴铁木、郭秀峰、邢铁山合著的《深翻与增产》一书，以中共长葛县委名义发表，从更深更多的角度探讨了深翻与施肥，深翻与种子（下种密度），深翻与浇水，深翻与管理等方面的辩证关系，批判了“深翻越深越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以及“种子下地越密越好”等错误做法。该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后，1975年又再版发行。

（作者陈中岳：曾任长葛市国税局局长）

1958 年建长葛第一发电厂的经过

赵裕民 陈东英

1958 年 2 月 21 日（农历正月初四）上午，我刚上班，副县长孟广秀把我叫去说：“研究建一个发电厂，县委吕炳光书记提议，由你负责筹建，设备（发电机）可利用原县电灯照明公司的机器，人员由你调配，先从地方财政拿出 1 万元作启动资金，总之，你设法完成这项任务！”当时我推辞说我不行，孟副县长批评说：“有什么困难呀！问题再大也得完成！”就这样，在压力和信任的前提下，我接受了任务。

接受任务后，我一夜都没睡好觉，因为一没办电的经验，二没办电的技术知识，三没办电的人才。第二天我就骑上自行车到许昌发电厂取经求教。回来后，我向吕炳光书记汇报了筹建发电厂的计划，接着又与县人事科和转业退伍军人办公室联系，查阅档案，抽调人员：其中县文化馆开汽油发电机的技术员雷留信、县水利局口王机灌站柴油机机手许兆峰、县邮电局外线工张允良、县公安局公安战士王丙乾，还有从石固农村招来的电工郭仲贵和从退伍军人中调回的刘纪德，又从县直机关调来一名财务会计杨省吾，共八人，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讲了筹建电厂的计划和分工。

原来经政府批准新建的电灯公司仅试车发电数天，因资金、技术等问题而被迫停产。电灯公司撤销后，其设备由县财政科代管，公司旧址被县广播站占用，我们只好把地址选在城关镇政府和县防疫指导站所在地（都已搬迁）。两院共有瓦房 9 间，楼房 3 间，草房 4 间，占地两亩多，同时购买了简便的桌椅、木床和炊具等用品。

由于缺乏筹建电厂的经验，怕走弯路，使国家财产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加之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县委要求我们当年“五·一”前投产发电，时间紧，任务重，因此，我们带着问题又到开封电厂考察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发电设备的安装与运行，供电线路的架设与配套，各用电户照明线路的规划与安装施工，以及所需材料的采购与供应，用电收费及管理。经过 10 多天的学习，回来就组织施工。施工共分三个小组：一是机电安装组，由雷留信、许兆峰两位机电手负责，在院里搭起的简易工棚下安装机电设备，风雨无阻，光老柴油机全部拆修就用了 10 多天，安装后试车不成功。我又利

用与长葛飞机场的关系，将机场备用的60马力柴油机借来，请老机手张英师傅来安装试车，直至成功。二是物资供应组，我委托县五交化公司负责，从郑州市五交化公司采购所需电料，包括粗细黑皮线，各类五金工具及电灯泡等，要啥供啥，保证施工所需。三是线路施工组，主要聘请的是郑州电力施工队人员，共15人、规划的供电主干线路由电厂向东至古仓街，向南至衙后街，再往东西两边延伸，使县直各单位和县城各街道都用上照明电。在规划挖电杆坑时，为了加快速度，县委研究决定，从1957年全县刚被划为并正在集训的“右派分子”中调出60人，其中，56人挖电杆坑，按白天规划好的电杆坑位，一人一个坑位。电杆坑要求1米见方，深2米，一晚上完成任务。待我们次日组织验收坑位时，大部分已挖成，一小部分还在继续挖，8点以前即全部完成交工。立杆工作主要由聘请来的电力施工队施工，由电厂向外架线，每天以12档的进度逐杆进行架设、安装，固定线位。每根电杆各架起四根电线（全是绝缘黑皮线），二根火线，一根地线。电杆每逢转弯处，各打有“十字型”拉线两根，以防歪斜。在外线架通后，紧接着安装内线，即进入单位安装房屋内照明线。室内安装是根据用户提出的申请计划，施工组按计划配料发货，按用户需要安装，工完结算付款。

在安装的次序上，先县委、政府机关，再县直各单位，历时一个多月就按计划完成了安装施工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4月1日晚，试车、发电、供电。电厂院内的灯泡全亮了。大家看到这种情形都高兴地跳起来说：“成功了！我们完成任务了！”接着我顺着照明电路检查，当进到县委院时看到路灯很明，以为是灯泡太大了，到政府院时看到院内的路灯勉强亮，好像电压不够似的、我立即追问安装施工队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队长叫立即停止发电、供电。检查后，是线路接错了，供电压是380伏，正常应为220伏，不亮的单位电压成了110伏，达不到照明需要。如供电时间长了，特别亮的灯泡会全部烧掉。

因没有经验和仪器，在线路接好后，没有用电压表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检查，因此出现了以上问题。他们施工队有此类仪器，经过一天的检修调整，故障完全排除。4月2日晚全县城正式供电。发电厂建成后，县委从县邮电局有电力知识的人才中选调梁海坤同志任电厂厂长，负责电厂工作。我仍回政府财政科工作，县委将这个柴油机发电厂命名为“长葛县第一发电厂”。

（作者赵裕民：解放初，曾在县政府财政科工作。退休到市水利局。）

简谈粮食票证在长葛流通始末

李华民

票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前票证是物资分配的重要形式，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使用过票证。如粮票、布票、肉票、棉花票、糖票、烟票等等。在这众多的票证中尤以粮食票证使用最为广泛，它几乎与人人相关。现就长葛历来流通使用粮食票证的简况介绍如下：

1953年12月，长葛实行统购统销。粮食统购以评产计购取代余粮统购，又以定产定购取代评产计购，城乡粮食统销也由群众评议，计划审批，逐步纳入农村缺粮定销、城镇分等定量，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日趋严密，这无形中束缚了人们的自由。但人类的社会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工、农、商、学、兵，又有固定的和流动的，既有加工制造者又有消费使用者等等，为适应各种需要，各种票证就应运而生了。

先说证：统购统销后，长葛县粮食局印制使用过临时供应凭证，1955年10月废除，统一使用河南省统一制定的凭证，计有：1、城镇市民粮食供应证；2、机关团体粮食供应证；3、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4、城镇饲料供应证；5、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6、市镇流动人口粮食供应证；7、农村中学生临时粮食转移证；8、农业人口临时粮食转移证（农民进城务工）和农业人口转为市镇粮食定量供应证（非农业）；9、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等九种。这些凭证全部由省统一规定格式，由县印制。凭证长、宽尺寸都有严格规定，内容包括编号、姓名、职业、住址、发证机关、填发日期、公私印章齐全等。

再谈谈粮票（料票），军用粮票：1955年实行定量供应军队和地方部队的粮食供应全部使用直拨办法，定量后部队供应实行军用价购粮票、军用粮票。这两种粮票仅限军队使用，涉及面较窄。地方粮票和全国流动粮票

1、长葛县干部下乡用饭粮票：此票是统购统销后为解决干部下乡吃饭专用粮票，分顿票和日票两种。顿票为7市两，日票为1.5市斤（16两制），供餐户凭票购粮。该票由县粮食局印发，使用至1955年10月作废。

2、农村购粮票：票额有5、10、30、50市斤四种。

3、城镇购粮票：票额有1、5、10、25市斤四种。

4、城镇饲料票：票额有 10、30 市斤两种。

5、流动购粮食票：票额有 1、3、5、6、1.5 市斤四种。

以上五种粮（料）票均由省粮食厅印发。

上述五种粮料票从统购统销起先后在长葛使用，直到 1955 年 10 月全国通用粮票，河南省流动粮票和饲料票统一启用后全部停止使用。

6、全国通用粮票：是全国通行的购买熟食、糕点和粮油食品的凭证，票额分 5 市斤、3 市斤、1 市斤、半市斤、4 市两多种。

7、省流动粮票：适用于不出省的流动人口，票额有 5 市斤 1.2 市斤、1 市斤、半市斤、6 市两、4 市两多种。

8、饲料票：主要用于运输牲畜、公园动物、种畜禽兽等，票额有 10 市斤、35 市斤两种。

9、长葛县粗粮券：主要为方便居民购买熟食、糕点和粮食复制品。该票出县无效。票额有 2.5 公斤、500 克两种。1985 年 3 月发行。

城乡居民如何取得粮票呢？

票证是无价证券，由国家粮食部门统一管理，不准买卖，只有按粮食供应政策支取。城镇居民外出凭供应证领取粮票，并在供应定量内扣下相应指标，如取全国粮票还要每 30 斤扣食油 0.5 斤，农村居民凭统销证或以现粮换取粮票，如取全国通用粮票还得每 30 斤交售半斤食油。

这些票证从 1953 年开始到 1993 年止，在长葛延续了四十多年。随着粮食流通体制的深入改革，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充分解放，工农业产品市场供应充足，票证则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那种外出先找粮票、吃饭先交粮票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李华民：长葛市粮食局干部）

长葛粮食工作回顾

程廉清 李华民

1948年12月，长葛县人民民主政府宣告成立。当时粮食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军需、民食，平抑粮价，打击粮食投机，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

粮食部门既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又是社会主义企业单位，它负有对粮食商品的流通、消费的平衡、调节、管理和经营的职责。粮食工作是工农业生产的桥梁，沟通城乡的纽带，又是保证军需民食、建设四化的重要支柱。建国后，立即建立统一体制、统一指挥、统一调拨的粮食机构。1953年5月建立长葛县人民政府粮食局。时有干部135人，经营单位9个。1954年8月，洧川并入长葛县，粮食机构网点发展很快，建立了13个区级粮食管理所，干部职工达225人，工作开展卓有成效。1957年7月县油脂公司并入粮食局，形成粮油业务统一的体制。

新中国建立50年了，粮食工作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实行统购统销、大跃进和经济困难时期、三中全会后转折性的变化四个时期。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48年12月，民主政权刚刚建立，解放战争正处于大规模发展阶段，支援前线是党和人民政府也是粮食工作的头等任务。在县支前司令部的领导下，粮库、物资库、运粮站于1949年2月突击借粮百余万斤，马草、马料近30万斤，猪肉3万斤，粉条、活鸡、布匹、鞋袜等物资，保证过境南下七十万大军的需要。

1950年大陆基本解放，由于战争创伤和帝国主义对华实行经济封锁，各大、中城市的粮食资本家、粮商、粮贩乘国家困难之际掀起粮价风潮，大肆囤积居奇，在中央“撑死米老鼠”稳定粮食局势战役中，长葛集中力量突击调粮1500多万斤支援上海、济南等大城市，为完成全国稳定粮价战役作出了贡献。是年，长葛的粮食局面已经打开，国家行政系统的粮食仓库和国家商业系统的粮食公司，已在主要集镇设立了网点，以大购大销的方式经营和掌握粮食商品，粮食市场购销两旺。土改完成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却发生了连

续的自然灾害。从1952年秋，粮食局势开始紧张，1953年冬达到严重程度。其间，国家粮食部门组织了五次大规模的打击粮食投机、稳定粮价的斗争，粮源缺乏仅靠行政手段控制只能缓解一时。1953年10月取缔私营粮商，国家牢固掌握了粮食市场领导权，虽然如此，缺粮食的紧张局势仍未解决。

实行统购统销时期

1953年是国家大规模有计划地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对粮食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粮源日趋紧张，供求矛盾日趋尖锐，不但没有外调之粮，当地供应也难予应付。1953年12月，长葛县人民政府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命令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这次统购，从11月中旬开始，由党内到党外，层层贯彻发动，召开扩干会、各界代表会、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学习总路线的伟大意义，学习统购统销政策，12月1日工作人员入乡，15日进入自报评议，到31日全县完成统购粮786万斤，占任务735万斤的106.9%。在群众生活尚不宽裕，余粮不多的情况下，十几天完成任务，时在河南省名列第一，长葛人民爱国主义精神永远载入史册。应当说统购统销是在粮食收购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在“多余多购，不余不购，缺粮供应”的原则下进行，但也普遍存在重购轻销思想。在“统购从严，统销扣紧”的思想指导下，造成连年统购透底返销，这与当时“左”的思潮有关。粮食统购统销是史无前例的新课题，以评产计购取代余粮统购，又以定产定购取代评产计购。城乡的粮食统销，也由群众评议，计划审批。随后逐步纳入农村缺粮定销，城镇分等定量的轨道。1955年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基本完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长葛的粮食工作由乱到治，由治到规范，是粮食战线兴旺发达的时期。

大跃进至“文革”时期

1957年末和1958年初，全体粮食职工进入轰轰烈烈的整风反右运动，紧接着狂风暴雨般的大跃进和应运而生的人民公社化，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兴起，粮食干部因反右扩大化处理50人，返乡生产10人。随着社会的大变革，处处放卫星、长运动套短运动，破陈规旧制，大破大立等政治口号下，废除了可行的规章制度，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狂热思想支配下，出现了高估产、高征购、高调出风潮。1959年粮食征购7272万

斤，占总产量的30.52%（正常年份都在20%以下），销售2798万斤，调出4500万斤，透支26万斤，劳民伤财。不仅如此，粮食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均处混乱状态，粮管所被公社粮食部所代替，肆意动用国家粮食，粮食局撤销了七个股室，干部职工减员84人，占总数29%，预决算制度废弃，报表制度中断，购销业务不开票，不记帐，一员顶多员，无人售粮店，看来很快就进入共产主义了。不仅如此，公社挪用流动资金无人制止，1959年就挪用20万元。商品超耗，损失严重，费用水平1959年达10.1%，万斤保管费激增到41.9元（平时10元上下）。总之，经过“反右”、“大跃进”、“反右倾保守”等政治运动，一时，唱高调、说大话，假、大、空得势，迫使人人谨小慎微，随声附和，失去了艰苦奋斗勇于负责的精神。

由于大跃进的失误，生产的粮食该收收不了，犁犁耙耙埋在地里算收获了。加上旱涝灾害，粮食减少。1960年开始，长葛的粮食工作陷入极端困难时期，集体大食堂多数停伙。1961年粮食总产1.106亿市斤，农民口粮免购点最高260斤，一般为220斤，1962年严重干旱，粮食减产，时全县42万农业人口，几乎都吃统销粮，其中每人每天吃粮4—5两（16两为一斤）占62.1%，7大两以上占34.2%，八大两到一斤仅占3.7%。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大种三瓜十菜，以“低标准，瓜菜代”的措施度过了难关。

1961年，首先恢复了1955年实行的粮食定产、订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全县订购基数2525万斤，实行增产不增购，超购加价并奖售工业品的政策。推行给社员自留地，预借地，开荒不计产量，不计征购，恢复自由市场，允许农民自由贸易，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群众称之为“救命政策”，粮食形势开始好转。十年动乱期间，长葛认真贯彻“要把粮食抓紧，要把棉花抓紧，要把布匹抓紧”的指示，狠抓粮食生产，对农民采取了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推行征购基数一定五年不变；坚持统一计划、统一收购、统一调拨、统一库存“四统一”管理体制，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整顿城市粮食供应等重大措施，使粮食工作在困难的道路上得以比较健康的发展，若不是遭遇文化大革命情况会更好。

转折性的转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进行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农村生产

责任制的推行，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禁锢多年的生产力得到解放。粮食部门顺应经济规律的运行，开放粮油市场。从经营上由封闭管理逐步放松，实行多渠道经营，由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民得到实惠，1979—1985 年仅粮油提价补贴，国家就拨出 402.7 万元，生产大幅度增长。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在党中央的重视下农业生产获得连年丰收。由于农业的丰收，12 个乡镇粮所的库容十分紧张，县直二级经营机构的粮食储量也是个個暴满，仓库建设速度赶不上农业增产速度，国家粮食大量储存在露天囤垛之中。

长葛历史上是个农业县，而且是一个收不抵支的缺粮县，从清代中叶到民国的二百年间缺粮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即是解放后的近 30 年间也是徘徊不前或者说稍有好转，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仅 20 年的时间，长葛的粮食问题彻底解决了。

克服了粮食问题上的左的倾向，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粮食经营部门实行经济体制政策，粮食工作才得以顺利发展，前车之履，后车之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应当记取。

（作者程廉清、李华民均为长葛市粮食局干部）

第一次赴海南岛育玉米杂交种

高庆尊

长葛第一次赴海南岛育玉米杂交种是从1966年10月初到1967年4月5日，历时半年之久。我当时作为坡胡农技站的技术人员，有幸被抽调到海南参与这项工作。

长葛是河南省到海南育玉米杂交种最早的县。我们到海南的具体地点是广东省海南行政区的东方县板桥人民公社的本廉和好瑞两个大队。

当时为什么要到海南育种呢？理由有：第一，玉米利用人工方法进行自交系配制玉米杂交种，是农作物育种史上的新突破，是一项新的农业科研成果。长葛是河南省的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单位，是省农业厅确定的玉米杂交种示范推广的试点县，组织上要我们在全省先行一步，发挥好带头作用；第二，主要是利用海南冬季气候温暖，适合玉米生长发育的气候条件和海南冬季稻田休闲不种的这个时间差，可以使我县杂交玉米播种提前一年。那年是11月下旬玉米播种，春节授粉，公历3月中旬收获。4月初运回，用于夏玉米播种；第三，利用海南的自然隔离条件。海南多是山岗、丘陵地区，森林多，自然屏障好，有严格的隔离条件，合乎玉米杂交育种要求，可保证玉米育种的高纯度、高质量；第四，可以加快压缩春玉米扩大夏玉米种植面积，实行一麦一玉米两熟制的步伐，扩大夏种指数，增加粮食的年亩产收益；第五，适应新品种取代旧品种的需要，以“新双一号”和“新单一号”玉米，取代产量低的农家种——小籽黄和生育期长的“白马牙”以及“金皇后”等老品种。

在海南岛育玉米杂交种，除了要解决生活上很不适应的问题，就是采取应变措施，解决与玉米育种直接有关系的问题：（一）起埂播种，留沟浇水。我们所选的育种田是沙地稻田，土层较薄，不易渗水，种玉米不能平播，我们只好采取起埂种玉米，一埂两行，两边留沟浇水，向埂内渗透，也有利于排水。由于我们人少，又为了赶时间，同志们昼夜不停，很少休息，于12月5—10号完成了施肥、整地、播种任务。（二）战低温保壮苗。1966年12月下旬至1967年初，在当地出现了多年少有的寒流低温，夜间只有5℃左右的低温，使玉米苗受到了影响，叶子发红、发紫，植株矮小不

长。出现这情况，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深入群众了解访问防寒保苗的经验，根据浇水提温的科学原理，从元月8号开始，日夜奋战，用了7天的时间完成了育种田的浇水任务。加上元月15号天气转好温度回升，又及时追了肥，使玉米恢复了正常的生长；（三）抓玉米授粉关键期，确保玉米育种质量。当年2月下旬正是春节期间，又是玉米抽雄授粉的关键时期，按习惯，当地群众早已停工休息，杀猪、宰羊准备过年了。可是玉米育种田需要及时的母本抽雄和进行授粉，这是保证玉米育种质量和产量的关键。当时，我们人手少，忙不过来，只有向当地求助。在大队党支部的大力支持和组织发动下，动员党团员、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春节不休息。从初一一直干到初五，使玉米田的去雄授粉工作及时完成。以后工作由于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使得我们海南玉米育种工作进展比较顺利。这次育玉米杂交种600亩，收获玉米杂交种10万斤。其中生长期85天的早熟品种——新双一号，组合母本是（小金131×矮154）×父本是（W591×W153），面积400亩，亩产成种150斤，共计6万余斤，配制中熟品种——新单一号（母本525×父本517）200亩，亩产成种200斤，共计4万斤。还繁殖了少量玉米自交系。成种可示范推广夏玉米2.5万余亩，为我县粮食增产做出了贡献。

（作者高庆尊：长葛市农业局高级农艺师）

长葛县银行与转城票

王世荣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长葛县银行成立。一九四二年初，发行面额一元钞纸币一种。因它只能在本县辖区内流通使用，所以管它叫“转城票”。但是，发行仅数月，便发生了挤兑现象。结果是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吃亏。本应为理顺地方财政，促进生产发展的长葛县银行，却没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现兹就所知，录飨读者。唯时隔较久，漏误难免。深望知情同志，予以补充、订正是幸！

一、设置县银行的缘由

一九三八年六月，日军已侵占了豫北豫东地区，蒋介石无法抵挡，遂在郑州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虽暂时阻止了日军侵犯，但使豫、皖、苏三省四十四县广大地区造成了严重水患。在此情况下，为啥还要通令设置县银行？这还得从头说起。

国民党中央政府退至重庆后，即召集专家研讨战时经济问题，决定实行“清丈土地，整顿田赋，改革税收，理顺财政金融”等方针，以适应战时需要〔注1〕。一九三九年派行政院参事曹仲植为河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来豫推行这一方针。

曹来豫之前，河南金融界早为河南省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所控制。李是河南信阳人，早年留学美国，曾获纽约大学银行学系硕士学位。一九二八年回国进入河南省银行，已达十余年之久。他除施展所学开展业务，还办了五期银行人员训练班，训练学员五百多人，并吸收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多名，在河南金融界广布亲信，打下牢固基础。曹来豫后想插手省银行，而李汉珍却不买帐。曹是孔祥熙的得意高足，见李汉珍这位属下如此态度，心甚不满。两人由此产生意见，逐渐发展到不愿见面说话的程度。

曹在省银行插手受阻，遂根据国民政府所颁《县银行法》〔注2〕，呈请省府委员会批准，通令各县自筹资金成立县银行，另立银行体系，给李汉珍以抑制。并呈准设立“河南省县银行管理处”，由曹自兼处长，并延揽曾在日本留学专攻经济、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洛阳青年招待所总干事的伊川人蔡芷生为副处长。蔡是当时不可多得的经济人才，办事认真，更乐于助人。

李汉珍想拉他当省银行襄理没拉成，曹遂纾尊礼聘，始得为其助手。

二、筹建长葛县银行

一九四〇年秋，长葛县政府遵照省令规定，选出张风堤（本县城西北打绳赵人）、张应祥（又名月亭，县城内卓巷街人）、皇甫顺（字英华，城北五道口村人）等三人，到洛阳西工“河南省县银行人员养成所”受训。三个月毕业后回县。

一九四一年二月，县长唐绍庭（安徽巢县人）召集党政各机关负责人及县内士绅开会研究成立县银行。根据国民政府所颁《县银行法》第二条规定：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制，设董事九人，监事三人。并按第十八条规定：公股董、监事由县政府指派，商股董、监事由商股股董选举。县政府财政科科长为“当然董事”。经过协商研讨，由下列人员组成董、监事会，并选定银行经理及组成人员如下：

董事会董事九人

- 杨景贤 时任第一区区长
 郭奠五 时任第二区区长
 李广庭 县财委会主任委员
 李子杰 县党部干事兼县总工会理事长
 罗斗南 县政府财政科长（当然董事）
 高宜亭 地方士绅，城西北前白村人
 王泽六 地方士绅，住城内石头坡下边
 张华卿 县商务会常务委员，城西关《同德恒》粮行大掌柜
 朱景先 县西辛庄坡村人
 常务董事 杨景贤 [注3]

监事会监事三人

- 陈秀峰 县国民兵团总参议兼商务会会长
 孟硕亭 县西北大孟村人
 赵东山 字冠五，县东北赵明寰村人，时任第三区联保主任
 常务监事 陈秀峰
 经 理 张华卿
 行内人员 暂定
 张风堤 负责营业

皇甫顺 负责会计
 张应祥 负责总务兼出纳
 行 警 武森炎（城东关小武庄人）
 勤 杂 钟荣昌（城南魏庄人）

行址：暂设城内东大街路北陈绶若开设之“宏发昌”京货庄的临街楼上（即现在老城税务所处）。

资金：根据《县银行法》第六条“县银行资本总额最低不得少于五万元，商股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的规定，决议筹资五万元，按商、民各半分摊。商股由陈秀峰负责筹集，民股，即所谓“公股”，由杨景贤负责筹集。

就这样，官办的长葛县银行，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宣告成立了，并报请河南省政府转报中央财政部核准备案。但不久，张华卿以商务事繁，坚辞经理职务，遗缺由《长葛日报》社编辑高汉民（字贯五，后河东北徐庄人）接充。

三、集资开业与五贤峰资金委员会

一九四一年五月，高汉民接任经理后，将县银行搬至南门大街北首路西王秉均（字赞臣）家之前院。并对行内人员作了如下安排：

总务股 主任张应祥（后换刘伯宗）
 营业股 主任张凤堤（后换胡鹏九）
 会计股 主任皇甫顺
 出纳股 主任孙金瑞（字跃五，城内衙前街人）
 练习生 冀廷钊（城北小冀庄人）
 行 警 武森炎 李占标
 勤 杂 钟荣昌
 炊 事 朱某

银行组建就绪，但各方认筹资金只交有三万余元。虽经派人坐催，亦收效甚微。

原议定县银行代理县库，但县财委会委员兼审核组组长丁清如、委员兼金库组组长魏新斋怕削弱财委会权力，仅将学田收入〔注4〕、教育经费及有省所拨之普及国民教育款划归银行。而这几个钱，实不足以应付周转，又计划将征购军麦价款八百五十万元〔注6〕拨交县银行。但因此款须将军麦送交军队后才肯给钱，这仍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只好就筹集到的三万多元先行开业，再继续想办法。恰好，一九四一年暑假，长葛籍在外地求学的学生相继回县。他们为加强联系，当时由在河南大学经济系读书的王身修

(字静吾，县东坡王村人)，邀约陈锡庆（县东北庞庄人），张百襄（县西坡胡乡坡张村人）、马森辰（县南官庄人）、卢书珍（字席卿，县南姜庄人）、桂秉均（字宁民，县东南桂庄人），李秉全（县西水磨河村人），及在高师、高中读书的范荣萱（县西范庄人）、孙书珍（县西南王楼村人），王光炜（县东南王庄人）等，发起组织“长葛旅外同学会”，于是年八月在城内县中（今老城高中）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同学有五十多人，并邀请县党政机关负责人及士绅名流袁正卿、马敬斋、高玉洁、高风池、李子杰、罗培峰、路百占等出席。会上讨论通过了同学会章程，选举桂秉均为会长。每人缴纳入会费一元，会后聚餐，盛况极为热烈。

“长葛旅外同学会”的成立，引起地方上一些实力人物的注意，怕长葛这些“精华”团结起来对其不利。于是，就以培育人才、资助贫寒学生为名，成立了一个“五贤峰贷金委员会”。并先从银行拨出一批现款，对家境困难的学生，每人先发法币四十元。所谓“五贤峰”，是取郭奠五、杨景贤，陈秀峰三人之名各一字。寓意含蓄，听起来亦文雅。所谓“贷金”，实际是无限期、无利息的长期贷款。虽然其动机不纯，但也确实解决了一些贫寒学生上学的困难。

四、印发转城票

在“五贤峰贷金委员会”名义下，银行又弄到一部分钱，但仍感资金不足，遂又计议发行银行本票——“转城票”。

当时中央银行所发大面额钞票已流入长葛，而物价尚未大涨，小麦一市斤才二角一分多，谷子一市斤一角八分。这样拿大钞交易，找零常感不便。百元大钞兑换小钞，常要“贴水”三——五元。因此，他们便以“调剂市场、方便找零”为理由，呈请河南省政府转报财政部核准，印发面额一元钞票一种，总额十万元。

时处战争年代，内地无有专印钞票机构，再者印一点地方纸币，也不值得东奔西跑，遂决定在本县印制。

当时，长葛县城仅“成人美”、“隆兴阁”、“三民实业社”和陈秀峰的外甥张申所开的“同丰”四家石印馆。前三家自知争不过陈秀峰，只好眼看着由“同丰”独家去承印了。

“转城票”的图案，是由小学教员李廷兰（字梦生，县北双庙李村人）设计并绘制的。据笔者回忆，印刷为深兰色。从右至左正楷横书“长葛县银行”五字，下书“壹圆”，周围有交叉条纹，四角有“蝙蝠形”线条，四边围有花边，另有常务监事陈秀峰、常务董事杨景贤两人的签名及其正方形

小红印，橡皮打号器打有号码。形状大小同一九八〇年版五角钞人民币差不多。当时市面上售有一种作为烧化纸钱用的迷信品——“冥国银行”纸钞，因与“转城票”极相仿佛，故有人常讥它为“冥国银行钞票”。

“转城票”是用重磅纸印刷。因此种纸不耐折叠，发行不久，已捂拙拆绉不堪，纸态薄如棉纸。后由于物价上涨，纸币贬值，有不少人就拿它当手纸，也有用新钞卷成纸筒当吸“老海”工具的，真如废纸一样。

印发数额，据高汉民档案及笔者调查，呈报财政部批准为十万元，印时又增印两万元，石印馆又私印了一万多元分肥，总印数约在十三万多元。而收回仅十一万多元，尚有近二万元在民间。这自然是老百姓吃亏了。

县银行同其他大银行一样，存款贷款是其主要业务。但除指定的几项公款，几乎无私人存户。“转城票”投放市场后，贷款业务却活跃起来。当时规定：工商业户一次可贷款200元，农户个人可贷款50元，月息2至3厘；贷款期一般不超过三个月。但无论工商业户或个体农户贷款，都必须有两家铺保。逾期不还，由铺保负责偿还本息。因此，贷款户都是有权有势者和各大商号，真正的贫困户，则一个子儿也贷不来。有权有势者大贷“转城票”后，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或把“转城票”换成法币，往安徽界首搞长途贩运。有的还深入到敌占区贩卖“洋货”，大发国难之财。高汉民、皇甫顺、刘伯宗三人，利用手中之权，长期低息贷款，在县北五道口村开设“裕丰粮行”，并从双泊河水路上贩运货物谋利。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便发生了挤兑“转城票”。

五、挤兑转城票

一九四二年春季少雨，入夏四十天又无雨，全县老百姓都在为干旱着急。忽然，身带泥巴满身汗水的农民，三三两两奔向县银行，而且愈聚愈多。农民们为什么撇下旱魔而奔向县银行？原来，他们听说“转城票”不兴了。

这消息传播的最初，是几家商店找借口不收“转城票”。未停两天，市面上就公开拒收了。紧接着县银行门口便像赶庙会一样，挤得人山人海兑换“转城票”。这下可急坏了高汉民。他一面请县政府加派武装人员维持秩序，一面派人四出催收贷款。不论到期不到期，一律坐催归还。贷款户见腰插手枪的人坐着不走，吃饭时还得小心招待，只好另想办法还钱了。

在挤兑中，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假票。这对县银行来说，无疑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县银行马上刻了一个木质“作废”章，一发现“假票”，便盖上“作废”章。有时还训斥持票人几句。这使银行又获得不少好处。

有一天，城内石头坡居民宋恩照的老婆拿一百元“转城票”去兑换，因不满盖“作废”章太多，向县长张金印告了状。张派县政府收发主任郭跃天查处，把县银行总务主任张应祥关押了两天。张也因此一气离开了县银行，遗缺由县西溷水寨人刘伯宗接充。

什么是“真票”、“假票”？据银行解释：真票上有一个角的蝙蝠形图案尾巴两线条中间，有一半米粒大小的小点，没有小点的就是“假票”。天呀！纸票已拆烂不堪，票面已经起毛，油墨颜色已模糊不清，半个米粒大小的小点，又怎能分辨清楚呢？中国解放前历来是“谁有权势谁有理”，许多人只有自认倒霉。

发行仅数月的“转城票”，究竟为什么会传说“不兴了”呢？而且来势又那样迅猛？这也得从头说起。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返乡度暑假的中学教师路百占（城内衙后街人），在国民党主办的《长葛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好人在那里》的文章，揭露了当时地方上不少阴暗面，触怒了三个区长和一些联保主任，迫使县长唐绍庭将路百占砸镣下狱。路百占出狱后，即到临汝“豫西高中”教书。但对此入狱，愤恨难消，遂投书控告。河南省政府和国民党河南省党部都曾派人调查，情况属实，就是不处理。原来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和县长唐绍庭都是安徽老乡。如果认真查处，公事公办，他们的这个小老乡唐绍庭就会受处分，所以不论诉状盈尺，就是不办不理。

路百占久告不理，遂动了知识分子认真到底的强劲。诉状一封接一封，愤懑常形于色。豫西高中教师张仲凯见路如此情绪，遂与交谈，得悉其因，甚表同情。言他与郑州行政督察专员杨一峰有旧，愿代路转达冤情，请杨办理。路又详写了一份诉状交张转杨，并给张买了几包“老海”作为酬谢。

事又凑巧，中条山战役失败，负有直接指挥责任的卫立煌被免职，由蒋鼎文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且军政分开，由李培基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蒋因没兼上省府主席，即借口省府机构庞大，在洛阳不便挤李培基把省府从洛阳搬到鲁山办公。上边根子变了，唐绍庭的靠山也靠不住了，被唐委派的三个区长，也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时候了。

郑州专员杨一峰是豫北新乡人，北大毕业，曾任《河南民国日报社》社长等职。为人耿直，办事认真，不嫖不赌，不吸烟不喝酒，是当时官场中少见的专员。杨对唐绍庭贪污枉法，亦微有所闻，因无具体证据，未便查究。今接张仲凯转去路百占的诉状，非常震怒。当即电令唐绍庭同区长杨景

贤、郭奠五、翟慎修及财委会主任李广庭前往郑州“开会”。他们到后，仅李广庭一人返回，唐和三个区长被“席前留客”，锒铛入狱。先解洛阳，又转鲁山，同被押在河南省保安处之看守所内。罪名是“集体贪污、冤狱陷人”。直到一九四三年五月，河南大旱，蝗灾严重，为节省囚粮，他们才得取保被放回。杨等在鲁山吃官司，向长葛发电报要钱，总是发给县商务会，再转陈秀峰筹办。电报署名也是写“杨郭翟”，或“郭翟杨”，从不写真实姓名。款项也是由朱长春、张廷弼亲送，或派专人送去。对他们被押一事，从不让外人知道。

唐等在郑州被扣押后，专员杨一峰即派专署行政干部训练所主任张金印（河南新乡人）来长葛接任县长。张来后，仅说是“代理”，也没提唐等被扣押的事。一九四二年春，张的夫人来到长葛。这时唐绍庭的二太太朱正仪（山西人），只得找跟她哥朱正明当县府收发员的张鸿禧，帮她从内衙搬到二堂外西跨院西屋居住，才公开同唐任的财政科长罗斗南、金库主任郑升甫办起移交手续。而对唐等被扣押的事，仍是守口如瓶。但为啥会影响挤兑“转城票”？

原来朱正仪生就一副丽质，秋波流转，体态可人，早为一些纨绔年轻人所垂涎。只是因系县长太太，才未敢作非分之想。现既公开办起移交手续，知道县长已经卸任，朱又搬到二堂外西跨院居住，门禁自无内衙森严。西跨院南屋是卫士班住室。卫士班多是本县人，同一些小白脸也多是酒肉朋友，不管昼夜，经常来往。朱正仪自唐绍庭吃官司后，生活亦时感孤寂，因而常邀人作“竹战”消遣。先是只邀约女师教员赵明珠，或县府职员家属作陪，后有一些男熟人也参加进来。视为长葛“西门庆式”的人物张一峰、张多峰兄弟两个所闻（张多峰后被县长李乐安捕杀），还有翟慎修的弟弟翟维新，逐渐都成了唐二太太牌桌上的常客。这么一来，风言风语便传开了。一般人听了，不过一笑置之，而有心人听了，却揣摸起来。“转城票”是唐绍庭和三个区长利用他们的权力发行的，现在他们已经失去了权，并且蹲了监狱，那他们发行的纸票还有什么用呢？于是，“转城票不兴了”便传播开来，接着便发生了上述的挤兑现象。

六、长葛县救灾委员会

经过一阵暴风雨般的挤兑之后，县银行门前又逐渐平静下来。但信誉大损，除经办一点教育款项，几乎无业务可言。不料，大旱蝗灾却帮了银行的忙。

一九四二年小麦多旱死，秋收仅二成。一九四三年大荒，草根树皮食尽，真可谓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物贱如土，粮贵如金。小麦一市斤从二角

一分涨至二十六元七角，一年之间上涨了一百三十多倍。一小斗（14斤）麦，即可换耕地一亩。全县（不包括古桥、南席两乡镇）饿死五万八千八百零三人，出外逃荒一万六千一百二十九人，卖儿鬻女，随处可见。

在此情况下，县成立了“救灾委员会”。由县长孙锡璋（字文瑞，襄城县人）兼任主任委员，县党部书记长任副主任委员。内分教育、管理、卫生、事务四股。县银行经理高汉民兼任事务股长，他将上级政府拨发及各方捐募救灾款项，均存入县银行。这使县银行在挤兑风之后，又有了一点起色。谁知没多久，日本人又打过来了。

七、长葛沦陷后的县银行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寇侵入长葛前夕，县银行将帐册及现金500多万元法币均装箱入柜。由总务主任刘伯宗、出纳主任孙耀五、营业主任刘季五三人，连夜运至县城西后河镇。而经理高汉民、会计主任皇甫顺和吴福庆各带公款五六万元，则逃之夭夭。高逃到四川富顺县货物税局，当起了税务员。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县。

刘伯宗等三人将现金和帐册运到后河后，将帐册埋在后河东北三里徐庄村高汉民家的院内，由刘季五邀同其种地户寇乾和房客刘书贵（后河洼李人，租刘季五的房做生意）帮忙，会同刘伯宗、孙耀五，于深夜将现金保险柜秘密埋于后河镇东大街路北、刘季五家的北楼屋外后墙底下（现后河敬老院）。

长葛沦陷的一九四四年秋，不知那个败类向日寇驻长葛的所谓“军事指导官”小林令宜（后换封建善次郎）、“政治指导官”假鬼子吴家襄（河北人，县内一切政事均由吴决定执行）透露了银行存有保险柜这件事。当这一消息传到陈秀峰一伙的耳朵后，都非常着急，生怕现金被日本人弄走。可是，他们也不知保险柜埋放在何处。

陈秀峰找到刘伯宗等人，并约集杨景贤、郭奠五、路木森、陈俊明、侯庆甫、朱景先、赵东山、张荣九、武俊甫的弟弟武斌等人，把保险柜扒出砸开，将现金分了一部分，余约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陈秀峰说：“留点将来办学校或办公益事业吧！”将款交给张荣九拿去，入于“慎昌烟厂”。

抗战胜利后，县银行复业。当追究这笔现金时，分钱人都着了急。刘季五、刘伯宗、孙耀五三人害怕打黑枪，不敢说出陈秀峰等人扒保险柜的事，但又没法推御责任，因此去劝说寇乾和刘书贵，“准备坐监”，当“替罪羊”。事情一直拖到一九四六年，高汉民由四川回来，觉得找“替罪羊”也不是好办法。万一暴露真象，还是脱不干净，干脆报个“战争时损失”，一

笔了之算完。

八、抗战胜利 银行复业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县银行复业。但经理高汉民在四川尚未回来。一九四五年九月，县长翟树棠派县党部干事李子杰暂代县银行经理。行址暂设城内东大街路北“同兴泰”京货庄后院（现在老城百货大楼东邻）。行内人员仅剩张建荣、胡鹏九、娄茂亭三人，资金毫无，根本无法开业。仅挂个牌子在那里而已。

一九四六年元月，高汉民从四川回县。李子杰报请县政府，将银行经理又交给高汉民。高汉民面对这个烂摊子，也无法使它复苏。恰在这时，河南省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县银行经理必须具有大专院校经济或财会学系学历的人才得充任。高汉民虽在上海大夏大学读过书，但学的不是经济和财会，不符合经理资格。县长宋谔忠身边也无这类合格人材，遂令高汉民自行找人接替。高跑来跑去，直到六月才到开封找到张百襄。

张百襄，字赞甫，本县城西坡胡乡坡张村人，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当时在开封河南省直接税局当股长。税局正准备调他到豫西某地当分局局长时，高汉民到汴，死说活说，请张回县接当银行经理。张和高是换贴朋友，张扭不过高的纠缠，只得辞去税局职务，随高回长葛，于一九四六年七月接任县银行经理。张除接收三个人和几本帐，真可谓什么也没有。张通过关系，首先将银行搬到县政府内大礼堂后边东跨院办公。继将行内人员作了如下补充和整顿：

- 营业股 主任胡鹏九（名绍仪，县西坡胡乡坡西人）
 - 股员冀廷灿（住城内石头坡）
 - 刘凤元（禹县古城寺人）
 - 练习生张坤
- 会计股 主任王永岐（字子俊，董村乡坡王村人）
 - 股员李雅俊（董村乡北小李庄人）
- 出纳股 主任张建荣（住城内城隍庙街）
 - 股员孙文法（住城内衙后街）
- 总务股 主任张子美（县西水磨河人），后换胡欣如、李鸣九等人。
 - 文书娄茂亭（新郑县人）
 - 行警魏鹤林（县城西关人）
 - 张 坤（县西坡张村人）
 - 炊事一人

张又请准，县银行代理县库，全县财政税收统交银行。一切收支均按正规制度办理，并开展存放款业务。终日人来人往，很像是一个正规金融机关。这时，可算是银行的全盛时期。但也是命运多蹇，好景不长。不久，解放战争便开始了。

九、动荡流离到结束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长葛县城第一次被解放。从此，县境进入“拉锯”状态，县政府四乡乱跑，县银行也成了“流浪汉”。县银行的正常业务，自然也随之停顿。这时是抢杆子第一。对张百襄这位经济学学士来说，简直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勉强跟着东奔西跑。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坚决辞职不干了。县长李乐安派皇甫顺接任县银行经理，在城内城隍庙街张建荣家里草草办了交接手续，张百襄便离开了。

皇甫顺接任县银行经理后，原来跟张百襄的一班人亦相继离去。皇甫顺只得又找来：

冀廷钊为营业主任

王子俊为会计主任

赵明暄为出纳主任

冀合法为总务主任

县银行原有十九名员工，现仅剩五六个人。资金也仅剩 160 万元法币，按当时物价购买力，仅值“中州农民银行”钞 300 余元。

皇甫顺在县度过了三个月的“游击”生活，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只得率县银行人员逃往郑州。假郑州市府前街 22 号当起了“流亡经理”。资金因公款来源断绝而枯竭，所存些微现款，也被逃在郑州的县里的一些权势者挪借净尽。这时长葛县境已完全被解放军解放。县银行勉强苟延到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即郑州解放前夕，不得不宣告解体。所有人员亦各找各的出路去了。

长葛县银行成立七年另七个月（1941.3—1948.10），历经了六任经理：

张华卿（1941 年 3 月 1 日至 1941 年 5 月）

高汉民（1941 年 6 月至 1944 年 4 月）

（1944 年 4 月至 1945 年 8 月，长葛论陷，县银行停业，高汉民逃入四川）

李子杰（1945 年 9 月至 1946 年 1 月）

高汉民（1946 年 1 月至 1946 年 6 月）

张百襄（1946 年 7 月至 1948 年 3 月）

皇甫顺（1948年3月至1948年10月22日）

长葛县银行，几经周折，至解放葬“身”异乡，寿终正寝于郑州。

一九八九年元月十六日

[注释]

[注1] 清丈土地：长葛于一九四一年三月进行土地陈报，组织专人清丈，绘图，全县（不包括南席，古桥两乡镇）共分454段。计：

第一区 180段；

第二区 158段；

第三区 116段。

计地，683517市亩有奇。其中：

一等地（水地）305市亩有奇；

二等地（旱、坡、岗、凹）578776市亩有奇；

三等地（山、滩、碱、砾）85727市亩有奇；

免赋荒地（飞沙、荒山、荒滩不毛地）28708市亩有奇。

整顿田赋：长葛奉令裁并征收处等机关，设立“粮食管理委员会”，县长兼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负实际责任。长葛第一任副主任委员为县南尹家堂村人尹濂卿。一九四〇年财政部规定：将各省田赋划归中央，实行“征实征购”政策。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起，长葛县实行“征实征购”。

改革税收：增设直接税与货物税并行政策。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一日在河南又实行“烟类专卖”政策，并设置“财政部河南区烟类专卖局”于鲁山县城内东门里，全省内各烟厂派住“驻厂员”，监督办理税收工作。

理顺财政金融：统一货币。通令各县成立县银行。

[注2]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施行《县银行法》，共二十六条。

[注3] 长葛县银行成立时，设常务董事和常务监事各一人，负全面责任。自一九四二年杨景贤等人被扣押，在召开第二次董、监事大会时，改为董事长制，并由李子杰担任董事长。

[注4] 据一九四九年清理学田统计，全县为四千七百八十七市亩，年收入粮食二十五万六千市斤。

[注5] 军麦价款八百五十万元，因路百占告发，后军队派专人携款在县政府大礼堂召集各村保长，直接发给领去，未再经县、区、联保主任之手。

（作者王世荣：长葛市老城镇王庄人，县政协委员，史志爱好者）

往昔的南席镇

许正则

南席镇是个相当古老的集镇。传说周朝分封诸侯，“百里为王”，共八百诸侯国，其中就有“南席王”。南席镇解放前隶属洧川县，1954年8月洧川县制取消，属长葛县。

南席镇座落于双洎河东南岸河湾处，被河水和堤岸林带三面环抱着。北面浩浩荡荡的河水上横卧着一座敦敦实实的大木桥，沟通一河南北。河南岸大桥两侧开阔平坦的码头上，经常堆放着各种货物，码头附近，船桅林立。白堤、绿树、桅林、黄桥、波光、帆影，在晚霞夕照中，构成一幅绚丽的图画。原洧川县志所载“洧川八大景”之一“双洎流霞”，恰指此景观。

双洎河发源于密县阳城山，流经新郑、长葛、尉氏、鄢陵等县，至扶沟与贾鲁河合流，至周口汇入沙河。解放前远离京汉铁路的豫东地带，陆路交通不便，水运交通相应发达，当新、密至界首的水运畅通时，南席镇是双洎河线上的一大码头，遐尔闻名，彼时，河南省会尚在开封，由开封至许昌、南阳的“官道”又恰好经过这里，因此南席镇自然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和北上的朱仙镇，南下的赊旗镇（今社旗县），遥相呼应，繁荣齐名。

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促成了十八世纪末期、十九世纪初期南席镇的极度繁华。本文所追述的南席镇，正是这一时期的概貌。

兴隆的商业

往昔南席镇的繁荣，首先是商业的繁荣。那时南席镇靠水陆交通之便，成为粮食、棉花、竹木，药材、毛皮、骡马、食盐的集散地。稍晚，也是大烟、海洛因等毒品的集散地。镇内南北大街至桥头斜街，以及河北靠堤顺河街商号林立，据不完全统计全镇大小商号一百多家。其中大而名者有：“福茂”钱庄、“恒茂”当铺、“福升景”杂货行、“祥记”粮、棉、盐、骡马行、“永兴长”绸缎庄、“春和堂”药材行、“运记”皮行、“仁义正”杂货行、“大东祥”杂货行、李宗白药酒店、宋启明药酒店等等。

伴随商业的繁荣，工业、服务业也相应发达。南席耿家开设的卷烟厂，

生产红“十”字香烟，质优价廉，畅销各地；杜家经营的铸铁炉，能铸造各种农具、大小铁锅、火炉、旧式大型水车等；刘家经营的蒸酒馆，生意很大，养猪上百头，大者达千斤；此外胡家经营的小磨油作坊、时家经营的银货楼、水牛陈人宋旺经营的丝绸厂、山西人经营的醋坊等都很有名气。服务业方面，除众多的小饭店、小旅店外，最出名的有王老虎饭庄、“泊南春”浴池。据说当时所有的食宿店都是娼妓经常出没的地方。南席小吃也因互相竞争而形成诸多名牌，如宋根的水煎包、何天成的鱼汤、王合的豆沫、马四的牛肉以及“油炸双泊鲤鱼”、南席河北的热白豆腐、烧鸡等。

过去南席人盛传一个信条：“南席是块活地，专门发达商业，特别发迹外来户。”话虽如此说，实际上还是南席地理位置优越的吸引力、凝聚力所致。正因为如此，那些善于经商的回民，怀庆府人、山西人、陕西人，多来此定居开店。他们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兴旺发达。如“福升景”杂货行，就是李姓怀庆人经营的，他的生意不但资本雄厚，而且真正做到了“百问不烦，百拿不厌；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因而信誉很高，生意越做越广，长盛不衰。一个姓秦的山西人在南席经营醋坊，生产一种“山西老陈醋”，色、香、味俱佳，质量永驻，不但远近畅销，而且成为馈赠珍品，因而人们送以雅号“醋魁”。当时外地回民先后来南席定居的不少，有马姓、白姓、沙姓、火姓、铁姓、周姓等，他们虽只做些小买卖，但都因讲求信誉，机灵随和而博得顾客青睐。

解放前南席镇除国家设立的镇公所、税务所、邮政局等机构外，还有商户自己组成的商务会、同业行会，还有山西人、陕西人设立的“山陕会馆”。就此，也可以推想出当时南席镇商业的兴隆情况。

出色的文化教育

往昔的南席镇，不仅是商业名镇，是原洧川县的一棵摇钱树，文化教育也相当先进，颇具特色。

早在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原洧川县分五个行政区（南席是第三区），创立五所高等小学校，县城设第一小学，第二小学就设立在南席镇，第三小学又设立在南席镇属的游罕寨。当时二小、三小有不少文教名流，如著名书法家陶演人、张文炳，著名教育家何际龙等。后来尉氏县的教育名流王彩青先生在南席镇河北办起了“蓬池中学”，这在当时更是凤毛麟角。“蓬池中学”的办学宗旨是造福桑梓，虽为私立，收费很低。王先生亲

自主校，亲自讲课，并多方延请好友、名师，协力办学，所以学校办得有条不紊，升学率相当高，据说可跟当时许昌的“进德”、“培德”，开封的“黎明”、“两河”等私立中学抗衡。很早有这样正规、层次较高的学校使南席镇文风昌盛、人材倍出，自不待言。

文化艺术方面值得一书的是“南席小孩戏”（又称“科班戏”）。当时由南席镇商务会会长耿春波出面作“管主”，筹资置买戏装，道具、乐器，组织乐班，再招募十二、三岁的小孩二十余名，聘请老艺人王金堂作“掌班”，知名豫剧老演员韩小江、李连升作“教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教练，居然能登台演出一些传统节目，以后边学边演，走南闯北，越唱越响，数年功夫竟成了南席镇一个“家宝”。当时小旦“豁牙”，花旦尽美，小红脸耀卿，丑角“二批”，黑脸小龙等成了挂在群众嘴上的精灵、心爱人物。戏迷们对这些孩子扬长护短，简直不准“外码”对其谈半个“不”字。更有甚者，自己情愿什么事不干，跟上戏班给孩子们作勤务。说实在的这些孩子也着实争气、出息，他们中除“小豁牙”不幸早亡，令人无限痛惜外，其他长大成人，一个个成了豫剧名演，特别是髯生李耀卿，名丑高兴旺（即“二批”），后来在剧坛红极一时，成为一代豫剧大师。

此外，当时南席镇在“三月会”上演出“棚阁”、“抬阁”等民间艺术，也是技艺精湛，令人倾倒的。

“三月会”盛况

南席镇有传统的集、会，每天早晨有集，每月逢四、逢九有会，每年有古庙会，就是“三月十二会”。这些集、会今天依然存在，仍是理想的农贸市场，但因时过境迁，今天的“三月会”已失掉往夕的盛况。

早年，南席镇有规模宏大的“南席寺”（现已不存在），庙会因寺院而起，其中还加进一段“三月十二请城隍”的故事。据传过去南席镇有家姓王的，子媳是洧川城里人，洧川每年有城隍庙会，某年王家媳妇带领小姑回娘家赶庙会，她们来到大殿，见城隍像镏塑得金碧辉煌，峨冠、锦袍、博带，面如白玉，目若朗星，配上五络黑髯，显得异常潇洒。小姑含情脉脉，观望良久，见城隍手中那条黄缎子手帕，刺绣精工，于是趁别人不觉，偷偷将自己身带的黄手巾跟城隍换了过来。其实小姑的嫂子早有觉察，但佯装不知，腹晒而已。谁料小姑回家就得了病，整天无精打采，不思饮食。不久，竟死去。对小姑的暴亡，家人悲痛之余，满怀疑团，后来还是媳妇道破了真

情。于是南席正式承认洧川城隍作女婿，每年三月十二到洧川请城隍来赶庙会，十三日送回城里，多少年来，沿以为俗。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南席镇经济的发展，三月十二会虽未能摆脱封建迷信色彩，但早已形成规模庞大的物资交流会。那时南席镇的声誉远播，对四面八方的客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北边开封、尉氏，东边鄢陵、扶沟、通许、杞县；西边新郑、密县、宝丰、鲁山；南边许昌、临颖、周口、界首、六安、蚌埠、漯河、驻马店、南阳、以至汉口、襄樊等地的一些客商每年都来南席赶“三月会”。他们不少是提前一个月来与南席商务会接洽生意，租定摊位的。

三月十二会照例是三月初九晚上起戏，以后初十、十一、十二，一连三天大会，十二为“正会”。一般年份都是四台大戏对棚。另外有来自开封、界首、淮安、武汉等大型马戏团，每年不下五个团。白马、少林以及附近各寺的僧人，前来举行比武和讲经论辩大会。至于那些说书的，耍猴的，拉洋片的，玩调吼的，算命的，卖艺的，游方卖药治病的，卖小吃的，套圈的，剃头的，磨刀剪的，星秤的，点水烟的，叫街的，开顶的，……更是不招自来，云集而至。

会上有数不尽的当地土特产品，也有来自远方的驰名产品，诸如南方的茶叶、竹器，开封的糕点、木器，景德、神垕的陶瓷器，赊店的泥屐，招扶岗的木梳、篦子，新郑的红枣，密县的棉纸，以及京广杂货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赶会的人更是磨肩接踵，前呼后拥。午间大戏停演，数不尽的说书摊拉开战幕，争献拿手好戏以吸引观众，争取预定、写出。可惜当时没有统计数字，不能说出“三月会”巨大的成交额；更没有录音、录像机，不能形象地再现“三月会”的盛况。

如今双洎河干涸，南席大桥已毁，不但从新、密至界首水运不通，由开封至许昌的公路也相应改道，南席镇失掉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由“一块活地”变成了一块半死半活之地。因此，南席的商贸状况比往昔黯然失色。为了从朦胧的记忆中将往昔南席镇繁华盛况抢救出来，作为改革开放、振兴南席的借鉴，笔者走访了不少老年人，花了相当大的气力，但终因资料缺乏，只能实书记忆，所以不免挂一漏万，以讹传讹，尚希知情者补充指正。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四日脱稿

(作者许正则：长葛市南席镇山郭人，县一高教师。)

冠绝一时的石固商贸

王铁柱

长葛市石固镇历史上曾隶属许昌县管辖，工商贸易活动及市场在历史上就久负盛名。据民国 22 年（1933 年）《许昌县志·商业》载“石固为县西北区一大市场也。布市烟市曾冠绝一时，……山陕布客均集中于该镇，许昌境内业棉织者肩挑襁负，相望于道，该镇遂为布业一大集散场。重以清季鸦片失禁，烟庄林立，秦、晋、京、津各地之富商大贾挈金而来，捆载而去，……其贸易额之巨大，每年不下数百万。”

1927 年，冯玉祥将军主豫后，复禁鸦片，因而烟草成为石固商贸业的主要支柱。从事布匹、棉花、档发、马尾、印刷等业的也逐年增多。1936 年许昌英美烟草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相继倒闭（南洋烟草公司被英美烟草公司挤垮，英美烟草公司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学生、烟农及当地民族工商业者赶走）。盛产烟叶又号称“二许昌”的石固镇小型卷烟厂蜂拥兴起，1940 年发展到 40 余家。较著名的有公信、锦昌、兴业、振兴、鼎丰、利通、同心、久丰、兴成、新华、悦来、宏大、大通、裕中、华丰、予茂、鸿兴等，生产低、中、高档次 200 多个品牌的香烟。从包装上讲，有 48 支装、20 支装、10 支装的。大包 48 支装的品牌有地中海、经伦、鱼船、耕田、唯一、一手红心、凭心、金牛、五羊、陞山、嵩山、三角、大象、金鸡、雄鸡、踢球、蜘蛛、星月、牧童、美童，高档的有五湖、中山门、前门、哈德门、米苏里、彩蝶、粉包、金飞鱼等锡纸彩色装璜，有的还有进口玻璃纸外包装。盘纸、铝箔纸、口美令、糖精等原料，都是从上海购进的，加上当地产的优质烟叶，生产的纸烟迅速填补了许昌英美烟草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空缺，占领了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市场。

石固镇一带的半岗地较适宜烟叶生长，加上汝南上蔡的麻饼肥，生产的烟叶质地优良，有“许昌烟叶甲天下，石固烟叶冠许昌”之说。石固烟叶，品质优良，色泽金黄，香味浓厚纯正。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捕捉信息，抓住机遇，创办卷烟厂为龙头的各种经济实体。以鼎丰烟厂为例：开初由开烟行的黄聚九（王庄人，给太原市晋华烟厂代购烟叶）、串联朱敬先（辛庄坡人）、赵老七（岗河村人）、潘东（乔庄人）、司更申（司堂人）等几家大

户财董，组成以黄聚九为大掌柜、司更申等为股东的公信烟厂，聘请上海人王某为技师，1939年夏即开工生产。翌年，黄聚九又在南寨开久丰烟厂，朱敬先为大掌柜。烟厂红火时，往许昌、禹州收款提款都是成捆成麻袋雇车拉运，由店员赵德昌（赵庄人）押运，李建堂（坡胡人）、王书其（王庄人）、庆尊等武装人员护送。工厂最受高看的技师高额酬金，不断宴请，还有海洛因及女招待，而一般劳力的收入仅能糊口。当时大多数厂机器都是人力驱动，也有骡马畜力驱动。有一首歌谣说：“家有几亩地，不如绞机器，能够吃上大蒸馍，还有那看不完的大闺女”。对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时代的饥民来说，能当上一名工人，就是天大的好事。当时《中国烟草》杂志中载：有人估算石固卷烟的销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这种估算并不算夸张。

卷烟的发展也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如印刷、机修、裁纸、烟行、粮油供应、食品饮食、服装布匹、文化娱乐、交通运输等行业。出租汽灯、以后开石印馆的郭一九，原来家里很穷，开始只两盘石印机，三年时间发展到70盘，一二百工人，转眼就成了大商人、大地主。开“三民医院”的王孟杰，看见别人发了财，开起石印馆，还入股干烟厂。当时石固烟叶集贸市场有20多家烟行，20多家烟丝加工厂。油坊仅北寨就有5家，杨香甫“四知堂”油坊、张丙旺“合利勇”油坊，姚运油坊、赵金海油坊、杨聚九油坊都远近闻名。北寨向义街口有一家香皂厂，生产白兰、留兰香、四合一、绿宝香皂。南寨东后街有一家造纸厂。窑口人经营的东泰祥、景茂恒、刘灼华、侯太周、赵相德等10多家杂货店都很红火。南寨杨庆阁、姜姓、陈姓等10家粮行，以及北寨王六、王玉申等8家粮行，贺仁若、王国亭、白二祥等20多家白布行生意兴隆。杨家、赵家几家酒厂及宝丰酒在石固销路都很好。普裕堂、同德号药店，王孟杰等4家西医诊所，有著名中医王明正（褚河人）、黄耀五、张明九、王秋离等坐堂应诊。李家当铺、信孚钱庄，艾庄、山货回民经营的皮货，王玉贤、赵殿卿的京货绸缎布匹，李家颜料店生意都很兴旺。在饮食行业，仅石梁河大桥两旁就有20家水上餐厅。河坡有李海莲、牛乾4家饭铺客店，有李发冉、姚赖茶馆、戏园子和评书场。南北寨内还有几家骡马大店。杞县汽马车队、太平车队、架子车队，禹州、襄县、郑州、密县贩粮的马帮，禹州、密县运煤的独轮车队往来不断，往许昌、和尚桥、新郑、禹州天天都有几十头脚驴方便客商，1947年冬，南石固镇公所临垮前一次在西门外沟中公然劫路，一个小时就劫获贩粮马帮六七十匹。这群马帮都是禹县褚河、口王、画匠王等村村民，只有个别人逃出，其余人现金全部被劫掠一空。

从石固的一天，可以反映出当时商贸业的繁荣。天不亮，合寨李几十付挑菜的担子，花园、曾庄、郑庄几十份卖豆腐的，王国平、周清波、王庚仁等，八九份肉架子，刁拴、刁选等五六份牛肉车，崔狗娃、刘运、姚清海糊辣汤、豆腐脑，赵二黑、代黑等几家包子，赵国法、杨西庆的丸子都上了集，叫卖声、锅碗勺子的叮当声汇成优美的黎明交响曲。天亮后，烟叶市、辣椒市、粮食市等从北寨南街到南寨南街、东街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直到上午十点以后人潮才渐渐散去。下午三、四点，人就又多起来。两个戏园子、评书场、茶馆都挤满了人。七八点时，饭店、客栈、骡马店、行店忙活起来。入夜，夜市更是热闹，牛肉车、熟肉铺、烧鸡、茶鸡蛋、瓜子、花生仁等卖小吃的直到戏园子刹戏。烟厂夜班女工下班，烟厂店员打灯笼送封烟女工回家，夜里烟厂、商店、客栈的灯笼，还有理发店的汽灯，把大街照得通明。石固镇的古庙会、年、节日更是热闹非凡。1940年元宵节，牛家（许昌一带的名门望族）放烟火，鞭炮声中，火树银花，空中呈现各种彩色图象，“天宫赐福”、“招财进宝”、“八仙过海”、“唐僧取经”、“田野行猎”、“兔跑狗追”、“人赶鹰飞”，吸引满街人流，围观至深夜。各烟厂搭灯山，气势十分壮观。锦昌烟厂除高搭灯山外，还扎有彩灯——鹰球灯，宣传他们生产的鹰球牌香烟。人力驱动，飞鹰会飞、地球会转，鹰飞球转十分好看。牌坊上花灯，石梁河中河灯，20多处庙宇、8个城门上都有彩灯，似灯的世界，灯的海洋，把小镇装扮得灿烂辉煌。

红极一时的石固卷烟厂

周家臣

石固地处许昌、禹县、长葛三县交界。面积约2平方公里，居民有七千多口。源于禹境的石梁河由西向东穿过，将石固分为南北二寨。解放前，南寨归许昌，北寨属长葛。它是个古老的集镇，是工农畜牧业的交易市场，集市天天有，人常说石固街的集——常事（市）。还有个顺口溜是：南京到北京，没见过石固的“天宝宫”。省城到京城，从未见过石固的对花城。每天，赶集的人川流不息，人山人海，络绎不绝，胜过农村的古刹庙会。

石固卷烟厂，从1936年兴起，4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有“鼎丰”、“利通”、“鸿兴”、“兴业”、“富华”、“华丰”、“振兴”、“华兴”、“锦昌”、“泰城”、“集成”、“公信”、“平信”、“悦来”、“新甫”、“福康”、“宏康”、“宏大”、“天良”等四十余家卷烟厂。这些烟厂规模大小不一，上面列举的前六家规模最大。卷烟机和切烟机各两部，工厂都有百十号（人）。厂大，根子也粗，长葛首匪陈大肚（秀峰），黑枪手周新敬、伪镇长朱敬先、工商界把头儿杨玉恒，他们虽然都未出资，却都挂的有名，其它烟厂虽规模不大，也有六七十号人，烟厂多，竞争非常厉害，真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有的开业时间不长就被迫关闭，只是昙花一现罢了。烟厂倒闭，工人失业，有的人还乡务农，有的流浪街头乞讨谋生，可业主榨取了工人血汗，还照样逍遥。

解放前石固烟厂工人约有两千多人。烟厂有多样工种，有绞把工（主要力工，那时无动力机械，非力工莫为，后改用骡马拉动）、还有切烟丝的、裁纸的、粘纸的、捋烟筋的、封烟女工等。力工和技工都吃住在厂，其他工则是劳动在厂，吃住在家。绞把工最辛苦，都是年轻的男壮劳力，每天得干十多个小时。像赵戊己同志，就是当时的绞把工，他是个硬汉子，外号“赵大脚”。工人们都公推他为老大哥。解放初期就参加革命，曾任长葛县副县长。

石固烟的品牌很多，像“双机”、“恒大”、“三角”、“黑人”、“航运”、“金牛”、“飞马”、“飞人”、“猴王”、“美菊”、“海乐”等品牌比较有名，畅销各地，从包装上讲有48支装、20支装、10支装。有的烟厂为牟取暴

利，也假冒名牌以假充真。那时上海产的“牧童”牌和青岛产的“金飞鱼”烟名气很大，市场销路很好。故而“鸿兴”、“富华”和“兴业”等几家大烟厂就依仗陈大肚和伪镇长的权势，同样也生产这两种名烟。

石固烟厂的经理（即业主）大都是些地主恶霸或地方绅士，他们听到解放的号角就逃之夭夭，烟厂也大都解体。灵通人士早将股金抽走，工人只好回家务农或乞讨谋生。共产党在石固建立政权后，在“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履行中，“鼎丰”、“利通”和“华丰”几家烟厂得以保存。1951年通过工商业改造，合并为一家就是“鼎丰”烟厂。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鼎丰烟厂又并入许昌烟厂，资方杨海亭经理也入厂，后任生产科科长。当时许昌烟厂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也有石固的份，石固人民为此也感到骄傲。

（作者周家臣：长葛市一高教师。）

牛锡岑谈牛家私营企业

牛锡岑 口述/邢海江 整理

一、亲不共财

一家人不管是兄弟之间，或是父子之间，分散经营，互通有无，相互支援，但不能合伙做生意。我父亲牛桂亭性子傲，不愿和自己人合伙，怕生意好做伙计难掰。我五叔官五不务正业，三叔敬亭给他买了一个和合面粉厂，他懂（“懂”：挥霍。）光了，又叫我父亲帮忙，给他了一万元钱，还给他派了两个人。但他不好好干，把派去的两个人赶走了，父亲只好又把钱收回来。

其杰是我的二兄，其英是我大伯三子，他们都不好好干，结果被饿死。

父亲扶持了我的三叔牛敬亭。开初把他介绍给在许昌开办“襄八工柜”的天津八大盐商之一柴建三当伙计。因为他搞得好，柴建三信得过，成了儿女亲家。柴死后，把整个“襄八工柜”交给牛敬亭，他发了财，有了资本，生意越做越大。他的发展过程是：

他和我父亲分手后，开始办“宏康”商号，给美国人代卖煤油（牌子叫德士古），给英国人代卖卷烟。后又开办“信孚”银号和“天增仁”商号。“信孚”银号设在郑州德化街，专搞汇兑。天津、武汉、上海、西安、开封都设有分理处。大掌柜孔绍周（许昌人）河南省商务会主席。二掌柜杨晓峰（长葛人）很能干。“天增仁”商号设在许昌，经营棉花、线，从西北地区新疆等地买棉花向农民换线，线再卖给纺织厂，当时也很有利。掌柜刘怀三是孔绍周指定的，这个人也很能干。并在许昌开办卷烟厂两年。

三叔和河南省主席刘峙，省银行行长李汉珍交往甚密，经常一起打牌、赴宴。在刘峙主豫期间的一九三六年，牛敬亭当了国大代表。以后他常住开封，生意都交给了任用的掌柜经营。在开封他有三处宅院：袁宅街一处，炒米胡同一处，南大街四维里一处（解放后河南日报社占用）。

父亲牛桂亭的生意只有“中兴久”银号和“予华”花线行，有五十多人，从二十年代一直干到一九四七年。他常住开封，生意由掌柜干。他的宅院有四处，开封东屯李气车站、开封炒米胡同十九号、许昌南大街，许昌南关老电影院（电影院是自己投资办起来的）。“中兴久”经理杨寿卿，襄县人；李之俊，舞阳人。“予华”花线行是和别人合伙办起来的，有十多个

人，经理是杨寿卿，李绍如。开始只兑换棉线，后来也经销烟叶、药材等土特产品。

二、要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1、人权。选用人的条件是：做生意有诀窍，办事有决策，忠诚可靠，忠于职守。用人方面的规定有：

第一，人分三个等级：一是总经理，二是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三是伙计。总经理坐阵开封，企业由掌柜（经理）分管经营。分工一般是大掌柜管全面，二掌柜管财务、内务，三掌柜管外事联系、购销等。伙计们因才使用，分内勤、外事两套人马：内勤又分信息联络，物资、资金调配，发放、汇兑；外事是驻各地办事处，掌握行情变化，随时联系信息，办理汇兑业务等。

第二、掌柜根据自己的职权范围，有随时撤销、补充人员的支配权，和互相调配货物、资金的调度权。

第三、对人员的调换要特别慎重，不打草惊蛇，不伤感情，不致财产受到损失。要经常对人员进行考察，发现有问題不能再继续用的人时，名义上是派人去协助工作，使他不知不觉，最后取而代之。根据用人条件和规定，选了很多能干的人，但也有几次教训。米少卿是“中兴久”的伙计，阳舞人，常驻上海。他娶了个上海女人，摘自肥，克扣了三万多元，后来不用他了，他用克扣的钱在许昌做生意。芦寿春，舞阳人，常驻汉口，克扣了几千元，后来也不用他了。三叔开办“宏康”商号时在漯河设了一个代销处，亏空一万多元。经查对是一个巩县伙计娶小老婆、吸老海干的，就不用他了。

2、财权。财权总是统一核算、分散经营。第一、总经理对各企业单位投资，各企业单位承包利润，开展业务。即总经理对单位每年投多少资，单位根据投资总额计算出盈利计划，再作出完成计划的打算，下达到各承包办理处。一到年底进行核算。第二、总经理对企业投资按银行利息计算，每年不管亏赚必须保本保息，除去本息以外再算盈亏。第三、付酬分三等：大掌柜一等，二掌柜、三掌柜二等，伙计三等。扣除本、息（包括伙计投资）下余付酬。付酬又按完成盈利多少不同，所得不一。第四、开展正常业务需要资金时，分理处互相转借不计利息；如需经理投资，必须按银行贷款计息结算。

三、做生意要和

掌握信息，随行就市，根据市场要求变化而变化，有利则干，无利则转。三十年代有三大特点：①、帝国主义的洋油、洋火、洋烟侵入中国，当